



單向街書店遭遇生存困境。

單向街再搬遷事件

京城書店業繼去年光合作用關門大吉後，再起波瀾。三年前因為租金問題不得不搬離圓明園的獨立書店單向街再次因為租金問題，面臨搬遷窘境。

5月17日，單向街創辦人之一的于威發佈微博：「從2006年開始創辦的單向街圖書館，目前遭遇了一點危機：合約即將到期，房租大漲，無以為繼……七年來，它成為北京罕見的、濕潤的公共空間，交織了個人的理想，開放的態度，文化的棲息，思想的對撞。一定不能讓它變成一個愉快的回憶。拯救單向街。」

與三年前單向街圓明園店即將閉店搬遷之前，有讀者在網上發起募捐，號召4000位讀友每人捐100元錢，把單向街留在原地相似，今年也有讀者呼籲股東之一的許知遠騰騰而又理想主義的設想：將單向街現有的13個股東，擴大為1000個股東，「那時的單向街，也許會是一個真正自由的精神公社」。但很

■許知遠



快有人吐嘈：真要有那麼多股東，屆時書店的控制力或更弱。在今天的商業環境之下，獨立民營書店的生存之結是否真的無解？

單向街的指標性意義在於它的三大特點。其一，選書精到、有着一貫的準則和指引性；二，常年堅持高品質文化沙龍；三，股東乃至讀者中的文化名人效應。七年下來，單向街書店成功地成為北京乃至全國範圍內最著名的文化場所之一，並被外界當作是獨立書店的運營典範。本欄就介紹過在那舉行的一些書業活動。突如其來的二次遷址事件，將籠罩在它頭上的光環揭開，暴露出獨立民營書店在現今的社會環境和商業氛圍下孤軍奮戰，苦苦支撐的殘酷現實。

單向街書店成立於2006年1月1日，最初由圓明園邊上的一家廢棄畫廊改建而成。當時供職於媒體、出版機構的許知遠、吳曉波、于威、單里曼、張帆等13人每人出了5萬元入股，2009年10月，由於租約到期，書店不得不從圓明園東門搬到國際化商區藍色港灣。當時單向街做了一份名曰「單向街+藍色港灣=塞納河左岸」的提案，令藍色港灣非常動心，最終因為其特有的文化氣質及在文化群體中的號召力，「藍港」為單向街提供了條件寬鬆的租約，房租以收入抽成方式支付，為期三年。

三年租約將在今年7月19日到期，商區方面由於業態調整，要求單向街搬離目前所在的「左岸」，並向書店提供了兩處新址備選，並願意給予極大的租金優惠。問題是，單向街在藍色港灣的經營僅僅實現了盈虧平衡，提高房租，哪怕給予了優惠，也因為打破了平衡點而成為不可承受之重。

商區推薦的新址，有一處在酒吧街的店面並不太差，有問題的只是租金。三年前，藍色港灣拉單向街進來時，還沒有什麼人氣，現在當然每到周末已經人潮湧湧了，十足的一個時尚街區，大牌林立，如同置身國外的某個商業綜合體。對於城中不少的文藝青年來說，躲在這藍色奢華中一隅的單向街就是藍色港灣的全部，現在，他們不得不準備「挪

窩」。

下一個文化埋單人

在與藍色港灣多輪談判的同時，單向街開始尋找新的店面。曾經一度考慮回到海淀，那裡與眾多大學為鄰，租金水平也比朝陽要低，但朝陽在交通、傳媒、商業環境等方面優勢明顯，有利於單向街品牌成長，舉辦文化沙龍也有更多便利。據說，近期單向街和朝陽北路大悅城的談判頗有成效，朝陽大悅城是城中新起的潮流之地，裡面有一些設計店、電影院等相對文化的設施，果真如此，倒也皆大歡喜。等於暫時又找了一個文化品牌的「埋單人」。

同仁書店的經營窘境這些股東開店，本來就只是為了給同好和自己提供一個閱讀和交流的地方，盈利並非目的，當然還包括每個人都忙於自己的工作，沒有精力管理。最要命的是，用許知遠的說法，「我們的困境在於這一個大家都不讀書的年代，讀者空洞的同情、抒情方式的支持並不能帶來實際的意義。大家都喜歡這個公共空間，但來一趟更像是裝飾性的郊遊。」

1998年，在北大東門外的雕刻時光咖啡裡，許知遠讀到了鍾芳玲的《書店風景》：花都巴黎對我的吸引力一直不怎麼大……誘引我成行的，是一家傳奇的英文書店。也許這就是許知遠開書店起心動念之時，書店正代表著一種美好生活。

很多年過去了，許知遠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地感歎：「未來的書店會成為一種生活體驗、生活方式，但目前出版業是夕陽產業，當下的社會不追求精神生活，書籍、觀念、思想不佔據關鍵作用。如果一個社會裡，大家都在談論商業邏輯，那麼這個社會就完蛋了，大家都會陷入這個死胡同裡去。」

單向街裡，安民告示已經貼出：「7月搬家，新店址還在選擇，到時候會通過郵件、微博等告訴大家。」唯一可以確認的，就是單向街不會消失。這個「濕潤的公共空間」的下一站在哪，人人都在期待答案。

文：白金

本地書

文：梁小島

梁寶山的平常心

總是有那樣一類人，一旦你認識了他/她，就能看到一座城市裡隨脈搏起伏的毛細管。他們的個人故事或經歷，他們結識的朋友，機緣巧合，互相牽引和交錯，慢慢地從無到有結成一股生命力量。梁寶山（朋友們都喚她梁寶）就是其中一例。作為本地活躍的藝術評論人、藝術家，無論是她的藝術創作、她的書寫，還是她參與的行動，都不僅僅是她個人的軌跡，更可以視為香港本土藝術與民間力量的發展脈絡。

梁寶的最新文集《活在平常》，記錄了從2004年到2011年間，在博客上發表的各種思想與行動，比如參與的火炭藝術區的成立、反對世貿遊行等，難得的觸及到較私人的層面。奇怪的是，梁寶說自己是火急火燎的人，但她的文字，卻如夏日樹蔭下吹來的一陣涼風，立刻撫平心境。

而文集最特別的地方，是作為佛教徒的她，如何將禪修經驗與她對藝術的思考結合在一起。一方面，她關心的是藝術如何在當下進行，甚至介入社會思潮的運動，以及藝術家如何自處，如何對待自己的角色。另一方面，佛家禪修的內觀自省，對修行者的要求是脫離主體身份的自在放下。梁寶並沒有如宗教般，在書寫中強調兩者如何因果互動，而是老老實實的記錄「想在生命裡（狹義的）完成藝術所無法完成的事情」（李智良語）的可能。

「有說世界解咒（disenchant），藝術取代宗教成為現代社會中最後的精神價值。但從借用場地物料人手資源，到知識共享甚至世代交替，尤其在這個網絡年代，一路下來其實是結伴同行、環環相扣，真正特立獨行的時候少。置身其中，我們竟忘了許多事情起來自有因，互相依存才得以細水長流，否則早在孤獨中擱淺。」梁寶在書中寫道。

其實，這表明了作為一名獨立藝術家、自由工作者的處境和心境。梁寶說，一直以來，她追尋的問題，都是藝術工作者的工作倫理（ethics），孤獨的創作與生產者，如何聚沙成塔，讓個體的力量發生令現狀改變的力量。如今，這也是她在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課題。

這裡，就不能不提梁寶的新書發佈的地點。坐落在灣仔電車路旁的一座名叫「富德樓」的舊商業大廈，是支持香港民間社會發展的重要標誌性空間。除了各種民間團體外如獨立媒體、獨立紀錄片工作室「采風」、外文書店「藝鶴」等進駐外，還是不少獨立藝術工作者的「安樂窩」。梁寶在《活在平常》中記錄的各種事件，也正是她以藝術家身份在「富德」租用工作室期間發生的。近幾年，它更在工作室組織禪修的共修會。藝術家及NGO之間奇妙的協作和跨界，在這個奢侈的物理空間中得以實現其可能。

不過，梁寶即將搬離富德樓，為自己的心靈和藝術創作，尋求下一個新的歷練。但無論怎樣，對平常如實觀之，那變動中安靜，就是對她的支持。



要刊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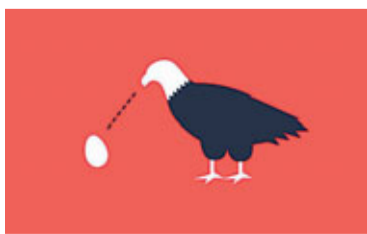
圖、文：Cate

The New Yorker 《紐約客》 02/07：

自美國「虎媽」引爆大眾對家庭教育的爭論之後，不少作家和評論人對此領域也都關注起來。其中，評論人Elizabeth Kolbert在Spoiled Rotten一文中，提到了人類學家對南美洲部落的兒童所做的觀察。原來，在南美洲部落的小孩視幫助家庭以及部落的其他成員為自己一份義務。與此反差顯著的是，生活在現代家庭的美國小朋友則不情願做家務，甚至和自己有關的雜物也懶得處理。在Sally Koslow的著作《Slouching Toward Adulthood》中，就講述了作者如何對從大學畢業、搬回父母家同住的兒子失望至極；另一本由前《華爾街時報》的記者Pamela Druckerman寫的Bringing Up Bébé，則探討了美國和法國家庭教育方法的不同之處，曾一度掀起法國熱潮。而在《A Nation of Wimps》一書中，作者Hara Estroff Marano解釋了其中緣由，這和美國父母太注重孩子的成績而忽略生活自理能力有關。

The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 01/07：

本期話題，討論了曾任職哲學系教授的觀察。原來，在《華爾街時報》的批評人Carlin Romano的新書《America the Philosophical》。作者認為，今日的美國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要更適合去實踐哲學觀念。但有意思的是，另一邊廂，有關知識分子在美國的地位大幅度下降的說法甚囂塵上。比如其中代表作有《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 and Idiot America》，書中指出不斷增長的地區保守主義思潮帶來的潛在不安定因素。儘管如此，Carlin Romano的新書在對美國哲學發展的歷史爬梳，以及對不同學派的區別，都有了較全面的討論。



The Guardian 《衛報》 01/07：

《紐約客》的專欄作家Joseph Mitchell近日出版個人作品集，名為《Up in the Old Hotel》。對於很多從事媒體採訪寫作的人來說，此本書的意義不容忽視。首先是Joseph Mitchell的採訪能力以及挖掘好題材的能力。特別是，許多他曾訪問過的人很多都有着怪異的行為，或者是社會的邊緣群體。其次，作家於1965年發表的作品《Joe Gould's Secret》值得留意。因為在那之後，直到作家1996年去世期間，他再沒有發表任何作品。但Mitchell在那段日子，依然如常的去《紐約客》辦公室上班，並時常在街上閒逛，和熟人聊天。在作家離世後，他的女兒找到了父親那些未被發現的作品。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 23/06：

本期介紹一本講述波蘭著名記者Ryszard Kapuscinski傳奇生涯的傳記《Ryszard Kapuscinski: A Life》，作者為傳記作家Artur Domoslawski。此書出版於2010年，今年才推出英文譯本。Ryszard最為人熟知的，是他對非洲的一系列觀察和報道。此外，這位記者的個人生活則充滿爭議。作家Artur Domoslawski是這位記者的好朋友，因此對他的思想有更深入的了解。比如記者在世界大戰年裡度過的童年，如何影響了他的生死觀念，以及納粹對他的家庭和鄰居所造成的傷害，直到成為共產黨員，但最後於1981年退了黨。

